

中華

教育家思想研究



武汉大学出版社

中华教育家思想研究

吴 芳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2年9月

鄂新登字第9号

中华教育家思想研究

中国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27.25

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7-307-01326-6/G·192

HK \$ 57.00



作者简介

吴芳，女，1943年2月出生。现任和兼任的职务有：北京中国国际书画艺术研究会副会长、当代中国画报社副社长、中国军地两用人才大学深圳分校副校长、武汉大学深圳校友会理事、香港太平洋书院客座教授、深圳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副教授）。长期从事教学科研工作。近10多年来，曾在国家一级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1984年7月调入深圳经济特区后出版过《历史名词解释》、《历史知识问答》两部书；1987年参加国际清代区域经济史研讨会，其论文《清代城乡井灌的作用》已收入《国际清代区域史》论文集；1988年担任了大型《中国历代教育家传》一书的副主编及其主要作者；1991年担任《中华女英杰》一书的主编，该书已发行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内外对该书的评价很高，影响也很大。

前 言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中国也是世界上最重视教育的国家之一，历史悠久，渊远流长。丰富灿烂的中华文化，闪烁着中国历代教育的熠熠光辉。

中华教育思想的发展史实，是历代客观教育的理论精粹，是历代教育思想家辛勤耕耘和智慧的结晶，是对社会的卓著贡献。它是社会生产、经济发展的产物，是伟大的各兄弟民族思想、文化、教育在社会演进中不断撞击、渗透、融合的产物，也是统治者政治思想需求的反映。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打破“学在官府”的一统天下，开私学之先河，百家争鸣，儒、道、墨、法各家教育思想异采纷呈，从而奠定了两千多年的古代儒家教育思想的基础。在经济、文化、教育一度鼎盛的唐代，韩愈“文以载道”的思想和改革文体的实践活动，《师说》的精辟论述，不愧为承前启后的儒学大师。在近现代，蔡元培为中国的教育事业、科学文化事业奋斗四十余年，特别是对高等教育的革新，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陶行知的乡村师范教育和平民教育的思想，杨贤江的马列主义教育理论，以及叶圣陶为发展人民教育和出版事业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世界教育思想的宝库中，中华教育思想积蕴宏博，影响力遍及五大洲。今天，当我们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开拓前进、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之际，《中华教育家思想研究》出版了，这本书既概述了诸家教育思想之精华，又不拘泥于旧说，

并有所创见，最是值得一读的。今将此书奉献给全国高等院校及中小学教师、行政人员和领导同志，奉献给学术研究同仁和海内外广大读者。通过研究探讨，取其精华，扬其所长，这对于弘扬祖国文化，促进新时期教育思想的发展，进一步繁荣中华教育事业，陶冶人们的高尚情操，都将是具有进步意义和积极作用的。

著 者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教育思想	(1)
第一节 孔子的教育思想	(7)
第二节 墨子的教育思想	(36)
第三节 孟子的教育思想	(47)
第四节 荀子的教育思想	(67)
第五节 《礼记》中的教育思想	(84)
第二章 秦汉时期的教育思想	(98)
第一节 董仲舒的教育思想	(102)
第二节 王充的教育思想	(116)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教育思想	(128)
第一节 嵇康的教育思想	(130)
第二节 颜之推的教育思想	(137)
第四章 隋唐五代的教育思想	(148)
第一节 王通的教育思想	(149)
第二节 韩愈的教育思想	(158)
第三节 柳宗元的教育思想	(168)
第五章 宋元明清时期的教育思想	(176)
第一节 胡瑗的教育思想	(182)

第二节	王安石的教育思想	(194)
第三节	张载的教育思想	(215)
第四节	程颢的教育思想	(229)
第五节	朱熹的教育思想	(244)
第六节	王守仁的教育思想	(261)
第七节	王夫之的教育思想	(272)
第八节	颜元的教育思想	(291)
第六章	近现代的教育思想	(303)
第一节	张之洞的教育思想	(304)
第二节	康有为的教育思想	(319)
第三节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332)
第四节	严复的教育思想	(342)
第五节	蔡元培的教育思想	(354)
第六节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	(370)
第七节	黄炎培的教育思想	(384)
第八节	陈鹤琴的教育思想	(395)
第九节	叶圣陶的教育思想	(410)
第十节	杨贤江的教育思想	(418)

第一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教育思想

据史书记载，周幽王嬖爱褒姒，废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为后，立褒姒所生子伯服为太子，引起申侯的叛变。公元前 770 年，申侯与缙侯引进犬戎攻西周，杀幽王于骊山下（今陕西临潼附近），西周灭亡。在这一年，周平王放弃镐京而迁都洛邑，是谓东周开始。从这年到公元前 476 年，史称为春秋时代。《史记》将周元王元年（公元前 476 年）定为战国七雄历史的开端，从这年到公元前 221 年，秦灭六国，是为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史书又把自公元前 770 年直至公元前 221 年秦统一中国，这前后 540 多年的历史，统称为春秋战国时期。

西周，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开端。据史料记述，周的先祖古公亶父被戎狄侵略，他率其家属和亲近的奴隶迁居岐山下的周原（今陕西岐山县）。据说古公是个心地仁和的人。邠和其他一些地方的自由民因而扶老携幼前来归附，这时的古公无力供给这些归附人的衣食，也不可迫使这些自由民充当奴隶。古公为缓和矛盾，发展生产，采用了商时的助耕制，建立了一种新的封建的生产关系。经王季、文王和武王的继续发展，促进了生产，终于强大得足以兴师灭商。文王称王时追尊古公为太王。

公元前 1066 年，周武王兴师克商，开始分封诸侯，实行大封建。所谓“封建”，就是分封建制。周在大封建中把某一地区的土地连同该土地上的人民一起封赐给诸侯，让他们去建立侯国。侯国对周王承担一定的

义务。同时，诸侯又可以把分封的土地和人民封赐给自己的家族和卿大夫等臣属，卿大夫也可以照例往下分封。但分封可以收回，也可以由得到分封者的子女继承。这种重重叠叠的分封，就构成了以周王为首的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从属关系。

西周的土地所有制是封建领主所有制，周天子是全国土地和人民的最高所有者，即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随着土地的分封，在形成一个封建领主的土地所有者阶级的同时，还形成了一个被土地所有者阶级奴役的、附着于土地的农奴阶级。

据古文献说，周代实行过井田制。《孟子·滕文公》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这种所谓的井田制，也叫助耕公田制，实质上就是劳役地租制。这些共耕公田的农奴，还要负担繁重的徭役和兵役，要向领主提供其他各种贡献，不准脱逃，尽管他们所受的剥削是残酷的，但和过去一无所有的奴隶相比，情况已有了一些改善。这时的农奴已有自己的妻子儿女，家室庐舍，有自己的生产工具，有自己的家庭副业。周宣王时还曾实行共和行政，废除助耕田公田制，改为征收田租。这种田租就是什一而税的征法。但西周的奴隶依然大量存在，主要用于从事工、商、农业劳动以及领主的家内使役。

据记载，在原始公社末已有养老和祭祀天地鬼神的隆重仪式，并且已有比较固定的场所。这些仪式正是当时教育的主要内容，而其固定的场所也就成了当时的学校。夏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礼记·王制》记载：“夏后氏养国志于东序，养庶志于西序。”据说，东序，是大学，在王宫之东；西序，是小学，在西郊。夏朝统治者特别注重习射，以培养武士。习射必兼习礼，要求射者与观者遵守长幼先后的秩序，故名其学曰“序”。商朝的教育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但有东郊的大学，有宫南之左的小学，还有“瞽宗，殷学也”。“瞽宗”由乐师瞽矇所主持，用作祭祀的地方，同时又是进行乐教、学习礼乐的机关。所以，殷商的学校不但可以学习一般文化知识，进行思想品德教育，而且还有专门学习礼乐的“瞽宗。”

西周的社会在逐步向前发展。西周的生产工具有了较大的改进，经济上实行封建领主的土地国有制；政治上实行以宗法制为基础的分封制

度，并按照尊卑、亲疏、贵贱、长幼、男女等区别，制定出表现等级制度的礼，用这种尊礼文化取代了商人假借鬼神而残暴无耻的尊神文化，在思想意识上由重鬼神逐渐变为重人事，从而决定了西周统治者对教育的极端重视和垄断，形成了“学在官府”、“官守学业”的局面。这也是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反映。当时的典章制度、文物图书、礼乐器具都收藏在宫廷中，学校和学术文化知识都掌握在官府中。

西周的学校有国学和乡学之分。国学是专为封建领主及其子弟设立的，分小学和大学。据《礼记·王制》记载：“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頖宫。”天子所设大学，规模较大，分为五学，名曰“辟雍”、“成均”、“上庠”、“东胶”、“瞽宗”。诸侯所设的大学比较简单，仅有一学，名曰“頖宫”。西周的乡学是按照当时的行政区域划分，为一般封建领主和庶民子弟设立的，只有小学一级。按《周礼》所记“乡有庠，州有序，党有校，闾有塾。”有些学者认为，就当时的文化发展状况来看，不可能有这样完整的学制网络，如按这个网络则可以说当时的教育已经相当普及了。

由于“学在官府”、“官守学业”，所以其教育制度则为“政教一体，官师合一”。乡学教师都由地方官吏兼任，国学教师则由朝廷官员分别担任，由大乐正总其成。

春秋时期，由于铁制农具和耕牛的使用，生产力提高了，从而影响了促进上层建筑的变化。在西周时还处于落后状态的各诸侯国，经过长期的休养生息，经济日益兴盛起来。西周灭亡，平王迁都洛伊，国势不振，王室衰弱，不再有控制诸侯的力量。各侯国为了争夺土地和财富，扩大统治权，则互相兼并，大国陆续出现，打破了诸侯并列、王室独尊的局面。到春秋后期，侯国兼并发展为大夫兼并，强宗陆续出现，打破了宗族并列、公室独尊的局面。强宗夺得土地，设县或邑宰，管理民事，开始建立地主阶级的政权。亡了宗的族党，各自分化，建立起家庭独立的经济单位，家族制度逐步取代了宗族制度。土地的宗主所有制逐渐转化为地主阶级的所有制。

齐桓公时任用大政治家管仲，废除公田制，改为按土地的肥瘠定赋税轻重，设卦官卖卦，设铁官制农具。数年间，国富兵强，称霸诸侯，先后并吞小国三十。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鲁废公田制，行初税

亩，按田收税。公元前 548 年，楚国按土田定军赋。公元前 543 年，郑子产执国政，于 538 年废公田制，作丘赋。由此可见，春秋后期至战国时期，按亩收税的田赋制又被各诸侯国先后采用，公田制瓦解。再加之兼并战争中人民的逃亡流离，大量荒地的开垦，地主和自由民阶层广为发展形成，新兴地主阶级也逐渐在一些侯国取得了政权。

春秋时期，仍然保持宗主名义的东周王国与宋、鲁是当时的三个文化中心，王国文化对诸侯国具有重大政治影响力。但由于王室衰微，王室拥有的土地大量减少，依靠诸侯国定期朝贡的重要收入几乎全没有了，王室无法养活众多官员。有专门知识、有技术的王官百工，相继分散到各诸侯国去了。这些人在侯国有的做官，有的做师。周景王死后，王子朝结合一批丧失职位的旧官、百工，起兵争夺王位，兵败后率领召氏、毛氏、尹氏、南宫氏等旧宗族和一些百工，带着王室所有典籍，逃奔到楚国，这是东周文化最大的一次迁移。周人和周典籍大量移入楚国，从此楚国代替东周王国，与宋、鲁同为文化中心。这也就成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局面。所谓“失官”，是指官员和文物典籍散逸到各诸侯国。

士，在军事上是指战车上的甲士，那时的甲士都是由下层贵族担当的；在文事方面，主要是做侯国的小官史和采邑的官史。士，是贵族中的最低层人员，他们大都受过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的教育，有较好的政治、军事素质。士中还有一些是所谓的食客，他们投靠在公卿、强宗门下做家臣，替主人奔走。主人则赏给他们一点“食田”，依靠食田上的租税生活。去职时即将“食田”交回。他们在行动上保持着较大的自由。春秋初期，据说有大小侯国 140 多个。在兼并战争的动荡中，以强凌弱，大批大批的小侯国被吞并了。毫无疑问，大批大批的贵族、公卿和士有的成为俘虏，有的则和他们的文化典籍一起转移到民间，并依靠他们的所长，谋取生活。这种学术文化的下移，为私学的发展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齐鲁是古文化的中心，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私学则应运而生，并很快向各地扩展。在齐地，孔子的儒家私学，为中国教育史开创了新纪元，经他教育的弟子达三千之多。他率领弟子周游列国，是私学一次空前的大宣传，为私学的崛起扫清了道路。在鲁地，墨子办私学，同样影响很大，与孔子的儒学并称为“显学”。孔子是新兴地主阶层的代表，

他开门讲学，删订六经，创儒家学派，建立起封建文化的主体。墨子代表劳动群众，创立墨家学派。战国后期楚人李耳，是具有丰富智慧的哲学家，创立了道家学说，主张清静无为，但又注重驾驭臣民的法术，受到后世统治者的重视。其他如法家、名家、农家、纵横家都聚徒讲学，都办有相当规模的私学，他们的学说影响在弟子们的辗转传播下不断扩大。

由于兼并战争的客观条件，诸侯国各自为政，士人的去留更加自由，他们的活动场地更大了。由于政治、军事上的需要，各诸侯国的统治者竞相“招贤纳士”，以富国强兵，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实力。为此目的，甚至不避前仇而引为己用。齐桓公在争夺王位的关键时刻，做过商人的管仲曾扶助他的弟弟小白，射过他致命的一箭，差点断送了性命。他取得王位后，曾发兵围鲁，想诛杀逃到鲁国的管仲。但为了争霸诸侯，后反而重用管仲，终成霸业。同时，士人为了谋求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为了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才干，也奔走各诸侯国之间，求得任用。孔子率领弟子长期周游列国，历尽艰辛，其主要目的就在于寻求能实施自己的学说主张的国家。

文化学术下移和养士之风的兴盛，促成私学的兴起和蓬勃发展，私学又培养了大批成为士的知识分子。孔子、墨子和诸家学派的弟子在学成之后，有的被老师直接派出去做官，有的游说于各诸侯间，直接进入仕途。春秋后期，不但各诸侯公门养士，那些卿大夫权豪之门，也竞相养士。在当时的社会中，已经把养士的多少，把士的聚散，做为衡量一个国家政治实力的标志。西汉的东方朔在总结这一问题时指出：“得士者存，失士者亡”（《答客难》）。这些士人虽然大都来自社会的中下层，但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中，很快便形成一个极有活力的阶层，在社会的演变中发挥着极重要的作用。

战国时期，七国并立称雄的局面虽已确立，但战争并未因此而有所间息，反而进入一个新的剧烈残酷的阶段。实际上这是一个新兴地主阶级，以及与其血肉相联的大商贾和士人推动大领主们为建立统一的地主政权而展开的一场大战。因而，养士之风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韩国的韩昭侯重用申不害，国力加强。魏国的魏文侯重用西门豹、李悝、朱羊及大军事家吴起，一度成为最强盛的国家。燕昭王招募大批贤士，重用乐毅，出兵破齐，成为北方的强国。在卿相中，齐国的孟尝君田文，赵

国的平原君赵胜，楚国的春申君黄歇，魏国的信陵君无忌，养士都在三千以上。秦本是位于西边的一个小国，秦孝公招贤八十，得魏国士人公孙鞅，变法图新，成为七国中的第一强国。战国后期，士人范雎、蔡泽先后入秦为相，也为秦吞并六国做出了贡献。帮助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的吕不韦，门下的食客也多达三千。布衣出身的苏秦和张仪，先后倡合纵、连横之说，都挂六国相印。极具生命力的士阶层的兴盛，无疑对私学的建立和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由于各家学说流派的形成和发展，使进入战国时期的私学和自由讲学的风气达到了最高潮阶段，体现这一特征的就是稷下之学。齐国本是古文化中心之一，加之齐国国富兵强，又与秦远隔，不受秦兵威胁。齐威王时则广延各学派文士到齐都讲学。至齐宣王时，招集天下文学士凡百千人，给予列大夫的优厚待遇，让他们各抒己见，自由讲学、议论，气氛活跃，这就是世称的“百家争鸣”。到齐湣王时，稷下学士更形兴盛。各学派文学之士从各国赶来齐地，参加讲学，以借此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和政治地位，有时竟多达数万人。这种自由讲学，自由争鸣，既有热烈的论辩，又有微妙的相互吸取和渗透，使文化学术在争鸣中得到发展和提高，意义重大。荀子曾多次到稷下讲学，初时他还只是一位年轻的学者，后来再入稷下时，他已成为学宫的主持人，成为“最为老师”了。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变革，一方面促成秦帝国的天下一统，另一方面则在政治上提供了一个宽松自由的时代。通过自由讲学，百家争鸣，推动了各种学派和学术文化的空前繁荣。不但涌现了象孔丘、墨翟、孟轲、荀况、李耳、庄周、韩非等一大批伟大的哲学家、教育家，他们著书立说，撰写了一大批经典著作，为中国古代的灿烂文化，为中国古代教育和教育思想开创了瑰丽多姿的重要篇章。而且还产生了像管仲、商鞅这样的大政治家；还有伟大的文学家屈原；伟大军事家孙武的孙子兵法，不但成为二千年来中国兵家的必读经典，而且成为现代世界军事家的研习课程。其他如医药、农业、历算科技等等，都有着伟大的成就。

总之，春秋战国时期，在军事上是一个兼并严酷的时代；在政治环境上是一个宽松自由的时代；在学术文化上是具有丰硕成果的时代，这些成果是中国人民极其宝贵的财富。通过批判继承是非常有益的。

第一节 孔子的教育思想

孔子是我国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思想丰富、深刻，寓有深邃的哲理，其基本范畴涉及的有社会政治、伦理道德、思想文化教育等方面。他在中华民族的思想和文化发展史上，影响的时间最久，程度最深。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中国在世界上被称为“文明古国”与“礼义之邦”，多与孔子的思想分不开。中华民族讲道谈礼的文明传统，宽厚宏阔的伟大气派与扶颠持危、见义勇为、杀身成仁的崇高的道德风范，可以说多渊源于孔子的思想的精华。他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思想更深刻地反映了人民的心声和要求。但不容忽视的是，孔子的某些思想和伦理道德观也长期束缚和削弱了人民与反动统治阶级作斗争的精神。

一、孔子的生平及教育活动

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昌平乡人（今山东曲阜），生于公元前 551 年（周灵王二十一年，鲁襄公二十二年）阳历八月二十七日，死于公元前 479 年（周敬王四十一年，鲁哀公十六年），享年 72 岁。他的先祖公孙嘉是宋国贵族，公孙嘉在宋国贵族内部的倾轧中被杀，其子逃亡到鲁国，传了五代，即到孔丘。他父亲孔纥，是个下级武官。孔丘不幸 3 岁丧父，和母亲相依为命，因家境贫寒，少年时期就走向社会，自食其力。据说，他曾做过吹鼓手，替人家做过杂事，很可能是事实，因为古时的“儒”，是专为贵族办理冠（男子成年时的礼）、婚、丧、祭等礼仪的一种职业，孔子自己也毫不隐讳地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这也说明，他少年时期谋生的多种劳役和艰难的经历，在孔子

思想里留下深刻痕迹，对他以后思想发展是深有影响的。孔子为人好学，少年时就通过做吹鼓手的机会习礼。15岁时由母亲托人带他到鲁国的太师那里去学习礼仪，因为当“周室（衰）微而礼乐废”的时候，鲁国是保存典籍实行周礼最完备的地方。另一方面他不懂就问，虚心求教，“入太庙，每事问”，从不怕别人讥笑。

孔子18岁那年“秋七月”，当上了“委吏”，给鲁国贵族看管仓库，后又做了主管牛羊的“乘田”。他工作认真，也很有能力。为委吏时，出入库的东西没有差错，帐目清楚；为乘田时，牛羊饲养得很膘壮。孔子19岁时结婚，越年得一子名鲤，字伯鱼。这时，他做了季平之家的“司职吏”，是个管理畜牧人员的小官，这是个闲差事。他利用机会发奋学习，文化素质迅速提高。他20岁那年，母亲去世，他回家守丧期间，因有些青少年去向他学礼，便辞去“司职吏”的官职，在家创办了私塾，“始教学于阙里”，边教边学，开始了儒家学派初期的讲学与研究活动，有时也发表些评议时事政治的言论。

鲁昭公十七年，孔子26岁，由于办学数年，与弟子们研究历史文化，评议时事，切中时弊，即被鲁国朝野视为闻人、名仕、学者，因而受到鲁国季氏的赏识，进入士大夫的行列。但鲁国当政者听信季孙的谗言诬陷，又驱逐孔子，孔子遂带领他的弟子离鲁到齐。他这次到齐国，主要是为了考察政治，研习礼乐。他“与齐太师语乐”研究音乐，听取了舜时的韶乐，学习了3个月，竟醉心到“三月不知肉味”的地步。后来，他又重返鲁国，一心致力于办学和研讨，有时也发表一些评议时事政治的言论。昭公二十四年，他34岁时，得到鲁君同意，乘着一辆由两匹马拉着的车，带着弟子宫南敬叔与一名随从，到周室考察周礼去了。

孔子在周考察时，曾到后稷庙参观，看到了庙右台前竖立着的铁人像，看到了铁人背上铸刻的“慎言”铭文。孔子虽然和老子的思想观点不同，但在这里他仍然和老子交了朋友，并协助老子替贵族办理葬礼，亲身体会了周礼中葬礼的进行过程。孔子访问周室，看到了历朝的许多文物，眼界、思路大为开阔，加深了对礼乐的造诣。历史、文化、政治、伦理道德等学识大为丰富，声望也提高了，就学于他的弟子也随之增多。

鲁定公十年，定公筵请孔子做了鲁国中都的地方官，即中都宰。他把教育和政治结合在一起，“以贤弟子”“为辅佐”，教民实施礼制。一年

光景，大收成效，中都地方出现了路不拾遗、器具不讲究过分华丽装饰的淳朴风尚。西方的一些诸侯也效法中都的做法。于是，孔子被擢任为鲁国主管水土等事的六卿之一的司空官。他以“地尽其利”、“物各得其所”为指导原则，使农、林、牧、渔的各业生产都得到了发展。之后，孔子被“擢（任）为司寇”，主管司法行政。他随从定公做辅臣，表现出外交、政治和军事上的机智与才干。定公十四年，孔子“以司寇摄行相事”。齐国对鲁重用孔子很是忧惧，便送了一队姿容秀美、能歌善舞的美女给季桓，使“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慨叹自己的政治主张难以实现了，因而打定了周游列国的主意。

孔子去职后，率领他的弟子周游列国，这是历史上第一个先进士阶层（知识分子）大组合的一次宣传活动。他们集讲学、考察、游说于一体。由于孔子在鲁国多年参政的卓著政绩，声名飞扬，所到之处均受到人民和一些国君的欢迎，不少士大夫和国君都来谒见孔子，向他请教政事。由于诸种原因，他们也多次陷入困境，甚至一蹶莫起。在蔡国的“二匡”地，由于孔子的身相和匡人仇视的阳货相似，竟被匡人拘禁了，即“孔子拘匡”（《荀子·赋》）。当孔子率领弟子们往来于陈蔡之间时，地处灾荒，当局又不于礼遇，生活竟困苦到“七日不尝粒”的地步，直至得到楚王的解救和厚礼邀请，他们才兴致勃勃地到楚国去了。

在整个周游过程中，孔子和他的弟子们，不吝辛劳，弘扬他们的教育思想，海而不倦，传播知识，宣传他们理想的“仁”道政治主张，以说服各诸侯国的统治者，并加以推行；孜孜好学，不耻下问，使自己的思想、知识进一步深化、广博。这次历史性的前无史例的大周游，于鲁定公十三年开始，到奉召从卫国归来，历时 13 年之久，风尘仆仆，颠沛劳顿，饱经风霜。虽然苦口婆心地游说了 72 位国君和当政大夫，但孔子的以“仁”为核心的治国政治主张，和当时王室衰微、诸侯争霸、互相兼并、穷兵黩武的图谋是格格不入的，因此，他们四处碰壁、壮志难酬。尽管如此，但他的声望却越来越高了。

从鲁国回来，孔子已是 68 岁的老人了。此后，他为鲁哀公在治理国事的政治、社会问题等方面，都提供了许多很好的政见，并抓紧时间，继续办学，与弟子们讲学论道，培育政治和教育人才。同时，以严肃认真的求实精神，整理出《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这